



保守主义 的含义

〔英〕罗杰·斯克拉顿 (Roger Scruton) 著
王皖强 译 刘北成 校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本书是 20 世纪末欧美新保守主义的扛鼎之作。
与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塞西尔的《保守主义》一脉相承。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保守主义 的含义

〔英〕罗杰·斯克拉顿 (Roger Scruton) 著
王晓强 译 刘北成 校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文版序

本书写于一届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出版时已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第一届政府。保守党在英国执政 18 年之后，我们再度有了一届工党政府，可已是迥然不同的工党政府，它已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承诺，并且接受了本书所描述的许多保守主义哲学原则。当然，是许多而非全部。

本书提出了传统托利党关于政治与社会的观点。以这一观点来看，古老的特权和代代相袭的传统的重要性远胜于我们当前的政治领导层的重要性。我希望，中国读者将会赞同本书字里行间所捍卫的传统主义哲学。无论如何，这种传统主义哲学与儒家思想一样重视忠孝，包含了我们在《论语》中所发现的对人类的不完善以及对权威的认识。

自本书写作以来，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英国，在欧洲，当然还有中国。世界之轮始终在转动，许多仅仅在十年前看起来还是永恒的东西，如今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政治中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政治思想的原则却一如既往。本书的定位明显是立足于英国，但我希望它在哲学上足以对中国读者有所裨益，不论你们是否赞同本书的基本寓意。

罗杰·斯克拉顿
马姆斯伯里，维尔特郡

中译者序

卡尔·曼海姆曾经指出，保守主义思想的发掘，往往不是由统治阶级自身，而是由一批自命为保守主义者的理论家来进行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保守主义的含义》，就是当代保守主义者诠释、重申传统保守主义基本原则的一部扛鼎之作。作者罗杰·斯克拉顿是新右派保守主义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具争议的理论家。

罗杰·斯克拉顿生于1944年，在剑桥大学获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69年起先后在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波士顿大学任教。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鲁汶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研究员。现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哲学系客座教授。

斯克拉顿属于那种典型的精力过人、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作家、哲学家，还是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出版商、商人和作曲家。作为一位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他创办了保守主义哲学小组，这个哲学小组对英国20世纪70、80年代政治思潮的转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他曾多年主笔英国及西欧最有影响的保守主义杂志《索尔兹伯里评论》。他还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观察家报》、《星期日电讯报》等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他创作过多首钢琴曲和器乐、声乐作品，所创作的歌剧《大臣》数次公演，颇受好评。

斯克拉顿先后出版过20多部著作，其中不仅有专业的哲学论著，还涉及政治、文化、美学、音乐等诸多领域。他还出版过四部小说。当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和美学，代表作有《现代哲学》、《艺术与想象力》、《美学理解力》、《建筑美学》以及《音乐美学》。

1980年，斯克拉顿出版了《保守主义的含义》，该书很快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议。为了回应各种批评，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斯克拉顿在1984年推出了第二版，增加了一个哲学附录《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时至今日，该书已数次重印，成为斯克拉顿在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代表作，被公认最集中地体现了英国新右派保守主义的思想。本文拟结

合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英国保守主义的嬗变，从纵深的历史背景对斯克拉顿的主要观点做一些概略的提示和分析。

一、保守与保守主义

在本书的《哲学附录》中，斯克拉顿指出，自由主义乃是一个有着许多重叠含义的术语。其实，“保守主义”这一术语的复杂程度丝毫不比自由主义逊色。按照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克林顿·罗西特的话说，这个术语的含义之多，不亚于它所引起的混乱、曲解和愤怒。每一个谈及保守主义的学者、政治家或自命的保守主义者，无不依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角度来界定、诠释这一术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罗西特本人对保守主义的界定就很有代表性。他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保守主义：本质上的保守主义、情境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哲学。^①

所谓本质上的保守主义，是指人们心目中的一种自然的性情，即抵制对习惯性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混乱的变化。换言之，它描述的是一种本质上或心理上的态度，是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性：习惯、惰性、恐惧以及好胜心等等。

保守主义的第二种定义与第一种相关，即它是一种态度，反对可能导致社会、经济、法律、宗教、政治和文化秩序分裂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们表现出希望维持现状的倾向，对激进主义的恐惧就是这种倾向在政治领域的反映。

罗西特的这两种定义不仅包括人的心理态度，也意指作为这些态度之结果的行为，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很难在态度与行为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在现实政治领域，本质上的保守主义体现为政治保守主义。罗西特认为它大体上等同于所谓的“右派”。罗西特认为，最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有英国托利党人、美国共和党人、法国戴高乐派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人。需要指出的是，罗西特所说的右派只是指温和的右派，没有包括西方右翼政治思想的另一个分支，即激进的或“反动的”右派。他特别强调，那些采取激进的行动以保全正在崩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的传统主义者，即

^① C.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ol. III, pp. 290–294.

“革命的保守主义者”，根本不属于保守主义者的范畴。

实际上，满足于现状的保守主义者与希望恢复到以往某个“黄金时代”的制度和政治安排的“反动派”之间同样难以明确区分，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往往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政党。显然，若依照罗西特的这种定义，会把一批地道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排除在外。例如，人们往往把法国以德·迈斯特尔为代表的极为重视传统和权威的保守主义者称作“反动派”，而非保守主义者。

最后一种保守主义是指一种哲学或政治思想体系，这种哲学或政治思想体系最早可以上溯到埃德蒙·伯克及其《法国革命感想录》。它致力于维护既定的秩序以及那一秩序中某些集团或阶级的领导地位。

罗西特的后两种定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保守主义政治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密不可分。不论是伯克的保守主义与当时的反雅各宾主义，还是当代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与撒切尔主义，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因此，我们可以将罗西特的定义简化一下，把保守主义大致分为小写字头 c 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大写字头 C 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前者指人们自身的一系列态度、观念、倾向，即所谓自然的保守主义或人们心目中的守旧思想，它包括罗西特所说的本质上及情境上的保守主义。后者包括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哲学，指与保守主义政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整套连贯一致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下文中涉及的保守主义就是指这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者就是具备这种政治信念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

问题在于，许多正统的保守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往往以保守主义缺乏明确的理论或学说而自诩，甚而彻底否认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教义，毋宁说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情感方式和一种生活方式。^①当代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伊恩·吉尔摩爵士宣称，没有什么比意识形态更容易引起分裂的东西了，既然分裂应当避免，当然应该对意识形态敬而远之。^②另一位保守党政治家黑尔什姆勋爵说得明确、也更动听：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兴趣根本不在政治，

^① R.J. White,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London, 1950, p. 10.

^② I. Gilmor, *Inside the Right: A Study in Conservatism*, London, 1979, p. 132.

而是在于“宗教、艺术、学术、家庭、乡村、朋友、音乐、乐趣和义务”。^①曾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末代港督的彭定康也曾出版过一本关于保守主义的书。他也罗列了保守主义者所关注的事物，其中包括书籍、音乐、绘画、工作、友情、娱乐、组成并维持一个家庭等等。^②

一些哲学家的看法也是如此。当代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经典地阐述了保守主义者的意向：“作为保守主义者，就是喜爱熟悉的事物胜过未知的事物，可信赖的事物胜过未经试验的事物，事实胜于玄理，眼前之物胜于遥远之物，充足胜于完美，现时的欢乐胜于虚幻的极乐。”^③

显然，奥克肖特属意的保守主义并不是、也没有打算成为一种政治信仰。但是，奥克肖特虽然表现出明确的反理性主义倾向，这种意向或主张却绝不是非理性的，其价值在于把这种反理性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政治判断的基础——伯克著作的主旨正在于此。如斯克拉顿在本书导论中所说，保守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无法系统、清晰地阐述，在迫不得已进行表述时，也是怀疑主义的。应该说，这是保守主义有别于对立的意识形态之处，我们不能由此认定保守主义不具备关于人类一般状况的理论。更准确地说，保守主义主要地是一种态度，间接地是一种政治信条。在另一本关于保守主义的著作中，斯克拉顿指出，如果保守主义者不能提供一种关于人类状况的理论，或是理解那一状况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提供关于自身立场的令人信服的理论，也无法提供他们希望保全的制度的理由。^④

追根溯源，保守主义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1594 年，理查德·胡克出版了《论教会体制的法则》，突出而明确地提出了保守主义的主要信念。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那么，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圣阿奎那乃至休谟，都建立起基本属于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体系。

但是，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政治态度，保守主义脱胎于对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谴责。埃德蒙·伯克 1790 年发表的《法国革命感想录》被公认是现代保守主义基本原则的源头。我们现在使用的“保守派”或“保守主义者”出

^① Q. Hogg, *The Case for Conservatism*, Harmondsworth, 1954, p. 10.

^② C. Patten, *The Tory Case*, London, 1983, p. 22.

^③ 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62, p. 169.

^④ R. Scruton, *The Conservative Thought: Essays from the Salisbury Review*, London, 1988, p. 7.

现于 19 世纪初。当时，法国浪漫派作家夏勃多里昂在一份旨在抵制民主思想的杂志中首先使用 *Le Conservateur* 一词。一些反对法国革命带来的民主进程的政治派别很快采纳了这个名称。例如，1830 年，美国的国民共和党人自称为 *Conservatives*；1831 年，英国的《旗帜报》称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领导的托利党为“保守党”。^①

英国是保守主义的发源地。这当然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及思想背景。仅从哲学传承上说，这与英国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密切相关。早在欧洲中世纪中叶，英国神学就已经出现了经验主义之光，英国哲学最终形成了重视经验的传统。经验主义一方面是唯物主义的表现，另一极端便是哲学上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对待理性的态度。同是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英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等大陆启蒙运动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人对理性持一种怀疑态度，伏尔泰、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则更多地强调理性的积极作用。

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为宗教的，一为世俗的。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克拉伦敦勋爵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塞缪尔·约翰逊、伯克、柯勒律治和牛津运动的主要人物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后者以绰号“骑墙派”的哈利法克斯（George Savile Halifax）、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和大卫·休谟为代表。^② 伯克之后，宗教的一支占据了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当是伯克本人的巨大影响。

《法国革命感想录》出版不到十年，英国及欧洲就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保守主义者：法国的博纳尔（Bonald）、德·迈斯特尔（de Maistre）、拉梅内（Robert de Lamennais）和夏勃多里昂等人无一例外地读过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并受到启发。德国的默泽尔（Justus Moser）、亚当·米勒（Adam Muller）、萨维尼（Karl von Savigny）乃至黑格尔，瑞士的约翰·弥勒（Johannes von Müller）、卡尔·冯·哈勒（Karl von Haller），西班牙的科提斯（Donoso Cortes）、巴尔梅斯（Jaime Balmes）等人亦是如此。上述这些人的

^① R. Blak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Thatcher*, London, 1985, pp. 6–7.

^② A. Quinton, *The Politics of Imperfection*, London, 1978, p. 10.

6 保守主义的含义

著作又成为此后数十乃至上百年间各自国家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①

在英国保守党历史上，本杰明·狄斯雷利是少有的几位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增添了新内涵的政治家之一。他在“青年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这个主要由保守党贵族组成的政治派系的主张定义为“封建的社会主义”）三部曲之一的《康宁斯比》中，对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你们要保全的是什么？

很多论者把保守主义视为一种维护现状，反对根本性变化的意识形态。塞缪尔·亨廷顿就持这一观点。在一篇名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的文章中，亨廷顿认为，保守主义首先是一种捍卫现状的意识形态，明确、系统地从理论上抵制变化。保守主义随所处的不同地位而变化，总是与对立的意识形态唱反调，却没有提供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理想。^②

1991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出版了《反动的言语》，勾勒出伯克以降保守主义历史演变的主线。赫希曼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出现三次大的反动，兴起了三次大规模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浪潮。第一次浪潮针对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权思想。第二次是针对普选权和大众政治的一场思想反动运动。最后一次是当代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和改革福利政策的尝试。

赫希曼归纳了保守主义者致力于维护现状所持的三个论题：荒谬论题，无用论题，危险论题。

按照第一个论题，任何致力于改变现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都将导致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例如，伯克之所以攻击法国大革命，其核心和出发点在于他认识到，以革命方式追求自由绝不会像雅各宾主义者希望的那样扩大和维护自由，恰恰相反，革命将摧毁维持有限政治的必要条件，从而彻底葬送自由。第二个论题是指试图实现社会转变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例如，试图消除财富或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运动不可能取得实效。第三个论题是指任何变化或改革的代价总是超出了所得。例如，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者强调扩大选举权破坏了宪政体制的平衡，乃是得不偿失

① R. Nisbet, ‘Preface’,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3, No. 4, 1978, p. 630.

② S. 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7, vol. LI, pp. 454 – 473.

之举。○

亨廷顿和赫希曼关于保守主义的论点，很自然地使人想起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附录《为什么我不是个保守主义者》中的看法。哈耶克认为保守主义缺乏对原则的认同，对社会性质不做任何理论上的思考，有时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最终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而言是破坏性、灾难性的政策和制度。

反对变革一直是保守主义者的主题之一。福克兰勋爵有一句名言：“凡是没有必要改变的，就有必要不做变动。”但是，保守主义者并非一味地反对变革。湖畔派三诗人之一的罗伯特·骚塞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改革，因为我无法眼看着一切事物都朝着革命发展，尤其是除改革之外没有任何可能去阻止革命。”② 实际上，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者，从伯克到奥克肖特，从第一位现代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到狄斯雷利乃至当代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都曾列举一大堆理由反对变革既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问题的关键是，那些理由只是针对右翼不赞同或反对的政治计划，一旦形势需要，保守主义者会同他们的竞争对手一样狂热地鼓吹和推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组。历史上的事例不胜枚举，最近的实例是英国的保守党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共和党里根政府。

实际上，保守主义自有其关于人类理想和社会构建的明确、连贯的观念和基本原则。

保守主义的第一项基本原则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主义者是性恶论者，他们总是强调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的邪恶、嫉妒、贪婪、暴力、懒惰和自私。保守主义思想最为古老也最广为人知的原则就是：他们相信“缺憾性”是人所固有的特性。保守主义的这一原则来自于道德和神学世界观，保守主义者关于人类不可避免的不完善的信念与基督教原罪学说一脉相承。对于人类而言，贫困、痛苦、不平等、不正义都是与生俱来，无法避免的，即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缓和这些缺憾，也往往是来自人们的自发行动，而非有意识的政治活动。

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出保守主义者强烈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在对待理性的态度问题上，保守主义截然不同于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高扬理性旗帜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个人理性的作用十分有限，它是一

① A.O.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Cambridge, 1991.

② R.Eccleshall, *English Conservatism since the Restoration*, London, 1990, p.14.

种脆弱的、靠不住的指导，以理性为指导的政治活动根本不可能达到人类至善的乌托邦。任何雄心勃勃的改革或激进变革都不可能克服人类无法战胜自身弱点的本性。

到现代保守主义者那里，对理性主义的抨击达到顶峰。在一本影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著作中，卡尔·波普尔猛烈攻击所谓“历史决定论”，认为出于纯粹的逻辑理由，人类也不可能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一回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①

奥克肖特把人类知识分为两类，一种是技术性（technical）知识，另一种是实践的（practical）知识。前者可以精确地阐述，属于告诉我们事物的机制和程序以达到确定结果的知识；后者则无法精确诠释，是一种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做的知识，属于需要实践和经验的知识。奥克肖特指出，人类政治活动即属于后一种知识的范畴：“在政治活动中，人们如同航行在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的海洋，既没有避风的港湾，也没有可供抛锚的海底；既没有始发站，也没有预定的终点……大海既是朋友也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寓于运用传统的行为方式之中，使大海在每个危机关头都成为朋友。”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有水平、经验丰富的船长要比整个航海计划更为可贵；一位明智的领袖人物也比任何政治计划更为重要。奥克肖特批评理性主义者总是试图以一种狂热而无益的方式使普遍准则的先验体系与自身偶然的、反复无常的希冀相吻合。这就使理性主义不仅不足取，还十分危险和有害。^②

在对理性主义进行了火力最为猛烈的抨击后，奥克肖特并未提出用什么来取代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推崇的是一种传统主义，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二项保守主义原则。

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表现出超乎一般的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传统的热爱之情，这当然与他们的怀疑主义直接相关。不过，与蔑视整个人类理性的霍布斯不同，伯克相信个人是愚蠢的，单个个人拥有的理智少之又少，但作为整体的人类则是有理智的。因而，“旧的成见”值得珍爱，持续得愈久、流传得愈广的成见越发可贵。伯克有个生动的比喻，即使我们不得已对建筑物作了某些改动，也应当尽最大可能在建筑物的外观上做出弥补。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进行变革的时候，也必须对传统有所保全。

^① 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2页。

^② M.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pp.127, 86.

同样，政治活动应该从现有的传统中来，现行的传统制度和机制是最好的，因为这些制度和机制凝聚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智慧。伯克列举了当时的传统制度：世袭的王室，代袭的贵族，下院，承袭了特权、选举权并拥有悠久自由传统的人民。当然，伯克眼中的“人民”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大众完全是两码事。他所说的“人民”是当时仅占英国人口极小一部分的有产者。在伯克看来，既然这一小部分人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特权、选举权和自由，那么这作为一种惯例就是最为明智的。伯克在论及英国习惯法时，特别强调它惟一的权威性在于它的存在源远流长，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惯例是最坚实的基础。

保守主义的第三项原则是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许多保守主义者都信奉一种社会有机体理论。在赫伯特·斯宾塞那里，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臻于顶峰。读者在本书的第三章可以找到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根据这一信念，社会乃是一个巨大的有机复合体，社会不仅仅是各部分的总和或各种社会关系的简单聚合。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有生命、有理智，既会患上各种病症，也会因为过度衰竭而死亡。简言之，社会与一个自然人毫无二致。人与人之间在天赋的能力、性格、禀赋乃至野心等方面千差万别，导致人类内部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会形成差异，分出高下。等级之分是自然形成的，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等级制度都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特征。由此，卢梭的著作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法律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法律上消弭社会等级的企图，自然受到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保守主义者认为，政治活动的宗旨是极力维护社会之健全，而平等主义者的努力将使人们丧失社会认同感，破坏社会机体的健康。

由上述原则可以引申出保守主义的第四项原则，即坚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广泛而明确的分离。保守主义者坚信，社会是完全不同于政治权力的权威的真正源泉，社会中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教会、各种中介团体和组织以及社会阶层的自然作用，奠定了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雅各宾党人和其他激进主义者冷酷地运用政治权力，就会毁灭或者说试图毁灭古老的社会和道德领域，而这些领域对于个人的社会认同及公民自由、宗教自由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保守主义者坚持认为，政治活动应当是有限的，历史上许多最恶劣的罪行和最大的失败都是试图通过政治权威实现最高人类理想的结果。保守主义政治家不应完全以政治组织来谋求权力，而是应当寻求一种更为广泛、非政党政治的支持和赞同。保守主义政治不应当遵循某种单一的社会政治模式，因为国家并不具有、也不应当具有决定人民生活方式的最终权力。

保守主义政治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末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①

实际上，在国家的角色及作用问题上，保守主义者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希望的是悲观主义的霍布斯式强大国家。霍布斯笔下的人类总是十分可悲地处于互相交战的混乱状态。人们为结束彼此的倾轧厮杀而与统治者订立契约，组成的强大的“利维坦”。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不完善的人类必定无法自发地和平相处，从而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所以，利维坦既是法律的提供者，也是人们道德规范的约束者。显然，霍布斯式的国家并非自由意志论者所倡导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利维坦的职能不是保护一系列抽象的自然权利，而是超越于国防和法律等职责之上，同时也包括举办一些慈善事业和初步的劳动福利，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严格限制的。

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对于一个过于强大、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又持怀疑态度。因为一旦不完善的人类拥有了过多的权力，势必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政治活动就是在一系列无可逃避的恶之中作永恒不断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探询国家作用的一个适宜的、恰当的限度。至少在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坚持政府作用的有限性始终是保守主义政策的核心。按照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话说：“对社会自发力量的信念，对政府无法决定人的命运的信念，以及社会进化的神秘而无限复杂的过程的信念，所有这些使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对国家卷入经济生活及其他领域做出严格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不是普遍的和一成不变的。”^②

保守主义的最后一项原则是维护宗教及教会的地位，这是一项在 18 及 19 世纪时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狄斯雷利就曾表示：“英格兰的宪法并不只是关于国家的宪法，它是一部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宪法。”^③ 直到 20 世纪初，保守主义理论家休·塞西尔仍将保守主义的首要任务确定为维护英国国教的地位，反对任何对教会的攻击。^④ 当然，当代保守主义中宗教的成分已经大大减少，但宗教的重要性仍是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斯克拉顿在 199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即强调，没有宗教，法律和道德即失去了权威，宗教观

^① N.O' Sullivan, *Conservatism*, London, 1976, p.12.

^② T.E.Utley, *Capitalism: The Moral Case*, London, 1980, p.263.

^③ F.O.Gorman, *British Conservatism: Conservative Thought from Burke to Thatcher*, London, p.30.

^④ 休·塞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 年。

念广泛而深入地渗入到当代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许多自然倾向和传统习俗与成见的源头，当代保守主义者的任务即是回击自由主义对宗教的抨击，维护以宗教观念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①

二、英国保守主义的源流

大诗人 T.S. 艾略特自称是文学上的复古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王派。他曾经区分政治思想形成的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理论先于实践，他称之为“机械的”途径。即先有一种教义，或是一部经典著作，一批信奉者致力于向所有的人传播这一教义并使之大众化；接着，他们组成一个政党努力实现以这一教义为基础的计划。这样一来，在达到统治地位以前，他们就已经构想了其教义所规定的某种社会终极状态。与此相反，另一个政党在充分认识并认同于自身的永久信条之前，就已经有自身的历史。要发现它的核心信条，只有通过仔细考察这一政党的历史行为，通过全面审视该党富有思想、更为贤明的人士的言论，只有准确的历史知识和明智的分析才能辩明永恒的原则与短暂的教义之间的区别。^②

显然，后一种途径是理解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最佳途径。保守主义者确实具备政治原则，只不过这些原则是得自政治实践。换言之，保守主义者关注历史，因为历史即意味着传统，也只有把保守主义视作一项传统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它。实际上，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党意识形态的历史完全是在作为传统而开始的。

约翰·穆勒曾将英国保守党称作“愚蠢的政党”，想必他的本意并非贬低保守主义者的智慧，因为英国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诗人、政治家，从休谟到波普尔，从柯勒律治到艾略特，从皮尔到温斯顿·丘吉尔，都是保守主义者。穆勒的看法一方面反映出他个人的哲学和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英国保守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保守党的基本纲领时常发生变化，而且往往是作为对新变化的反应。另外，保守党领袖作为政党信条的象征，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保守主义政治及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考察英国保守主义时应当注意的两个基本特征。

^①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1996, p.8.

^② D. Willetts, *Modern Conservatism*, Harmondsworth, 1992, pp.3–4.

英国保守党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 1688 年光荣革命后的托利派，先后担任首相的小皮特和利物浦勋爵领导的政治派别也是保守党的前身。总的来说，1832 年议会改革前，传统的托利主义是各种意见和主张杂陈的混合体，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在议会改革中，托利派领导人持坚决反对态度，但最终被迫让步。改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贵族政治衰落的开端，而领导“保守党人”适应这一变化的就是罗伯特·皮尔。

从意识形态上说，1834 年皮尔发表的《塔姆沃斯宣言》标志着作为近代保守党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的诞生。从政治上说，皮尔的成就在于重组古老托利党的组织结构，建立了适应新环境的保守党。1841 至 1846 年执政期间，皮尔式的保守主义致力于将传统的托利主义与新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起来。一方面，皮尔强调和保存了老托利主义的许多成分，如健全而有力的政府，法律与秩序，维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不少保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将经济的发展从封建性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简言之，皮尔式的保守主义的内核是自由市场加上强有力的政府。

然而，皮尔并未彻底解决党内土地贵族利益与新兴工商业阶层利益之间的冲突。1846 年，围绕废除谷物法问题，保守党分裂为两派，直到 1867 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后，保守党才重新形成一致的方向，这就是狄斯雷利的“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从这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狄斯雷利认为英国分裂成穷人与富人这两个彼此互不理解的民族，应当通过扩大选举权的办法将这两个民族合二为一。1867 年的议会改革法案主要是在狄斯雷利的大力推动下，才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不仅比自由党对手的主张更为激进，也大大超出他本人最初的打算，被称作“冒险的举动”。有论者认为，作为一项长期政治战略的体现，改革法案的通过表明保守主义党人不再固守于反动，而是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能够做得很好。^①

在 1872 年 6 月 24 日的水晶宫演说中，狄斯雷利提出了保守主义的三个目标：维护国家的制度，捍卫英帝国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第一项目标是老托利主义关注自由、秩序、法律和宗教的延续，后两项则是狄斯雷利为保守主义新增的内容。

^① B. Coleman, *Conservatism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n 19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1988.

狄斯雷利从伯克那里继承了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反对包括功利主义在内的抽象权利的哲学。从社会生活的延续性中，他看到了历史传统对孕育民族特性和国家制度的巨大作用。狄斯雷利关于英国历史的看法是来自柯勒律治，然而，面对当时工业革命造就的城市阶层，尤其是人数和力量上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狄斯雷利强调特权阶层“高贵的义务”。他主张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弥合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裂隙，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工人阶级拥护有序的等级制度。他所主张的“托利民主”(Tory Democracy)，不仅仅关注人民的选举权，也包括他们的福利。在狄斯雷利看来，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共同体。虽然它是一个阶级社会，却被笼罩在“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强有力相互义务的网络之中，而正是社会的不平等赋予了精英阶层的统治以合法性。换言之，狄斯雷利式保守主义的目的是调和阶级矛盾，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进而促进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狄斯雷利对保守党及保守主义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他是极少数为保守党意识形态增添了新内容的领袖之一。从政治上说，狄斯雷利解决了皮尔未能解决的调和土地贵族利益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本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使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使保守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奠定了保守党在 20 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整个 18 世纪及 19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里，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敌人是自由党人和自由主义。然而，从 19 世纪末起，保守主义者开始把矛头对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保守主义者已经明显地开始采纳和捍卫他们以往所反对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策。从这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守主义者主要担忧的是日益强大的民主政治的压力。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富有的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土地所有者，也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保守党力图使自身迅速适应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1885 到 1902 年间，索尔兹伯里勋爵长期担任保守党领袖。他基本上延续了托利民主的原则，只不过他对大众政治持悲观态度，决意维护英国古老的制度，试图利用保守党来延缓和控制民主进程。他认为民主政治和福利措施不可避免地将伴随着对宪政平衡的三种威胁。第一种威胁在于人民主权的胜利，这意味着下院将逐步取得对君主制度和上院的支配地位。第二种威胁在于，每一个政府要想取得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的支持，就必须组成大众性的政党。这样，政党利益的考虑就会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最后，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民主的前途感到忧虑，认为民主主义将导致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与

狄斯雷利不同，索尔兹伯里勋爵把政治视作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他对工会力量的日益壮大尤其忧心忡忡，悲观地预言工会最终将统治英国，随之而来的是军事独裁的统治。^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政治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战后英国政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工党逐步取代自由党成为两党制的另一个支柱。另外，战争期间国家干预的作用大大增强，使得保守党内集体主义的倾向大大增强。这一时期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没有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增添什么新的内容。他于1924年推出的“新保守主义”主要是狄斯雷利“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延续，内容包括强调社会的和谐，党的领袖的作用，推进社会改革以及保护下层的弱者。从实际结果来看，鲍德温的保守主义成就有限，主要是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1924至1929年间推行的一些改革。

这一时期，保守党内部在国家作用问题上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歧。一方面，鲍德温等党内主流派开始从自由党人那里夺过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衣钵。战争一结束，保守党政府立即取消了战时实行的价格、运输、投资以及食品分配等方面控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回到了战前的老路：自由贸易，恢复金本位，保持预算平衡，低税收以及降低政府开支等。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前后，哈罗德·麦克米伦、R.A.巴特勒等人为首的一批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信奉国家干预的原则。1927年，麦克米伦等党内左翼就明确宣布放弃过去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观念，企图在纯粹的私人企业制度与集体主义之间设计某种连贯的体系，对私人企业实行宏观上的国家控制，微观则置于私人所有制之下。1938，麦克米伦出版了一本名为《中间道路》的书，宣称要折衷自由资本主义与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不仅提出重新分配财富，把通货膨胀作为克服经济萧条的手段，还要求对公共事业进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立法保证工人最低工资，工会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等。^②

二战结束后，麦克米伦、巴特勒、昆廷·霍格（就是本书中提到的黑尔什姆勋爵）等党内左派逐步成为党内主流，“中间道路”成为保守主义的代

^① R. Eatwell and A. Wright (e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London, 1994, p. 79.

^② H. Macmillan, *The Middle Way*, London, 1966.